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9年10月16日（第201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学者评估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是对美国亚洲政策的有益补充。尽管特朗普政府做出了种种努力，但美国当前的做法似乎难以获得支持。

中美关系

中美在非洲的贸易竞争愈发激烈

CNBC 网站 10 月 9 日载文称，非洲已成为全球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而中国已位于这片新大陆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沿。近年美国与非洲的贸易额有所下降，而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项目主任贾德·德弗蒙特（Judd Devermont）表示，导致美非贸易额下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美国页岩气扩张、产品多样化程度有限以及非洲增长乏力。在美国对非出口时，美国汽车、机械和飞机等出口产品的成本相对较高是一大关键挑战，而中国生产的产品成本价格相对多样。德弗蒙特指出，并非只有美非贸易额在放缓，2010 年至 2017 年，非洲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都有所下降。

德弗蒙特指出，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地位也带来了益处。特别是，这些项目将帮助美国企业在全世界铁路和道路密度最低的国家运输产品和接触消费者。但他也称，中国企业在与非洲政府合作时，更有可能参与腐败行为，规避环境与劳动法，因为非洲政府对遵守国际标准不那么感兴趣。

德弗蒙特认为，不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任何一个非洲国家都没有在非洲竞争的格局中获得优势。“至少目前，美国和中国企业在不同的领域都很活跃，它们代表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更多欧洲在华企业调整战略以应对美中贸易争端

中国欧盟商会 10 月 10 日发布针对其会员企业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面对美中贸易战，更多企业正在进行艰难的战略调整，

以适应这种不确定的紧张局势。

主要调查结果包括：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表示，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收到关税影响，19%的受访企业表示进口商品价格上涨，5%表示价格稳定；44%的受影响企业改变了供应商，而其它受影响企业则在美中“边界”附近重新安排全球生产；35%的受访企业表示，美国征收的关税影响到其对美出口，但绝大多数企业表示将保持价格不变；分别有3%和8%的受访企业表示将把生产移出美国和中国，6%表示将增加在华投资以避开关税风险，15%表示，它们推迟了在中国的投资或扩张。

报告称，许多欧洲企业通过调整战略和供应链，绕过了美中贸易“边界”。一些公司已经成功利用自身的全球业务或其他市场高度多样化的供应链转移生产，从而完全避开关税；另一些公司则利用欧洲品牌享有的高质量声誉，这意味着它们往往可以在不牺牲市场份额的情况下转嫁成本。

中国欧盟商会认同美国对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不满，但不同意将关税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商会认为，美中两国领导人应该进行真诚的谈判，以结束贸易战，并切实推进中国的改革议程。

美官员考虑加强对中资企业的审查

《纽约时报》网站10月10日报道称，美国政府官员正考虑可能给北京带来经济痛苦的方案，以迫使中国改变长期存在的规则，这些规则使美国公司处于不利地位。

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些人考虑让白宫把谈判工具从关税转向限制中国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并对中国企业实施更严格的审查。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在内的政府官员已开始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施压，要求加强对中国企业的审查。他们还在寻找减少

美国退休基金对某些中国公司开放的方法。一些白宫顾问现在认为，这些升级选项是迫使中国做出深层次经济让步的手段。

最近美国政府官员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如果当前这一轮谈判未能解决美国政府的主要关切，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讨论的焦点在于，加强对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查，及限制政府运营的退休基金对中国直接开放。美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近日承认，政府正在寻找方法保护投资中国企业的美国人。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白宫内部正在传阅一份由哈德逊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 起草的备忘录。备忘录提议，对违反财务披露规定的中国企业及其员工追究刑事责任，扩大可能导致中国知名企业在美国被列入黑名单的标准，并限制中国投资美公共和私人养老基金以及大学捐赠基金。

备忘录还讨论了加强美台关系的可能性，以及如果确定“香港的自治得不到尊重”，则扰乱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资本流动的可能性。

美学者称美应制定非对称的防御和反击战略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欧汉龙 (Michael E. O' Hanlon) 撰写的报告称，受中国崛起以及俄罗斯复仇主义的影响，与中俄的潜在军事冲突成为美国当前国防政策和资源配置的优先事项。

美国及其盟友会出于何种起因、以何种方式与俄罗斯或中国发生战争？美国需要充分解答这个问题，而后才能更好地优化国防投资、加强威慑并缓解冲突。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俄罗斯或中国对美国盟国的一小部分领土发动小规模进攻。此举更多是为了展示国家实力，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而不是夺取领土。北

京或俄罗斯将试图削弱美国重要的双边联盟或北约。

华盛顿很可能对这种情况反应过度。美国军事机构和国家安全界倾向于认为，无论哪个盟友遭到攻击，能在战斗中打败中国或俄罗斯是现实且必要的目标。直接防御和迅速扭转侵略是当前战略的基本原则。北约条约第五条和有关双边承诺，都没有为更多解读预留灵活性和空间。

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制定非对称的防御和反击战略，把经济手段融入作战计划之中。事实上，非对称战略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战。军事回应也很重要，但通常只发挥支援作用，即建立防御线阻止敌方的进一步攻击，或确保经济制裁的实施。

美专家称美中战略竞争的四个关键领域值得关注

兰德公司亚太安全政策专家黑考特（Scott W. Harold）近期撰文称，特朗普政府目前采用的政策似乎不太可能令美国在美中竞争中取胜，这令美国的亚洲问题专家感到担忧。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亚洲问题专家普遍认为如果美国要与中国展开有效竞争，就必须重视盟国关系，共同利益、价值观与身份，连贯的政策，以及明确的战略、人员分工与资源。总体上，美国分析人士认为，至少有四个关键领域值得关注，这四大领域还关系到美国如何处理其跨大西洋关系。

第一，有观察人士担心，政府并未明确自身的政策目标以及与中国存在分歧的领域，这可能会令美国失去那些无意与中国展开全面对抗的国家的支持。这一问题不容忽视，因为欧洲大部分地区似乎都越发希望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

第二，特朗普政府释放出了前后矛盾的信号，似乎未能明确美国对华竞争的承诺程度。例如，特朗普曾表示他和中国领导人

将“永远是朋友”，但随后又给中国贴上“对手”的标签。

第三，鉴于中美竞争事关重大，特别是在国防与安全事务领域，一些观察人士担心，特朗普政府与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存在分歧。如果美国能够专注于与欧洲存在共同利益的问题，并采取欧洲大国能支持的方式，那么美国将可能利用跨大西洋关系与中国展开竞争。

第四，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警惕中国对欧洲内部和跨大西洋合作构成的潜在风险。如果美国政府重拾传统政策，全面接受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标准设定，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美英法德以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在共同发展并协作寻求对华共同方针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一方针的核心是规则、规范以及致力于多边秩序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共同身份。如果美国及其欧洲盟友能相互协调政策，同时与印太地区的伙伴深化地区安全合作，那么美国将可能为自由的国际秩序提供资源及支持，以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美国外交

CSIS 专家评估美日贸易协议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副总裁、贸易政策专家马修·古德曼（Matthew P. Goodman）10月1日撰文称，虽然华盛顿一直认为，特朗普在与日本初步签署的贸易协中得到了他想要的，但特朗普并非“大获全胜”，安倍也并非“一无所获”。

对特朗普而言，这是他上任以来成功签署的第一份新的双边贸易协议。该协议将缓解美国重要农业生产商对特朗普施加的政

治压力。但该协议是一份“迷你协议”。在农业方面，协议只是个“缩减版的 TPP”，因为东京拒绝履行之前所做的扩大对美国出口商大米配额的承诺，只提供了较少的小麦配额，而且显然没有为大豆提供新的市场准入。制药和金融等其他行业几乎没有从中获益。尽管特朗普和安倍在联合声明中承诺要达成第二项更全面的协议，但这不大可能在 2020 年大选前实现。

对安倍而言，他并未说服特朗普免除对日本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的关税，也未能得到特朗普的明确承诺，即不会根据“232”条款对日本征收新关税。但安倍也并非“一无所获”。首先，安倍想让美国重回全球和地区规则制定的道路，美日达成数字协议标志着双方朝实现“可信赖的数据自由流动”理念迈出了重要一步；其次，通过将具有争议的贸易问题放到次要位置，安倍希望将特朗普的注意力转移到美日联盟面临的更关键的问题上，尤其是遏制朝鲜的导弹计划，以及应对日益强硬的中国。

特朗普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僭越

外交学会网站 10 月 3 日登载该学会亚洲研究高级研究员米拉·拉普-胡珀 (Mira Rapp-Hopper) 的文章称，在与乌克兰总统的“电话门”事件中，特朗普利用美国的权力推进自己的政治利益，这种对外交政策的僭越将对美国产生持久影响。

如今美国是拥有强大强制性力量的大国。美国在国际机构中的领导地位使其能够诱使其他国家支持其全球议程，强大的经济实力能够向别国提供有条件的援助，并实施强有力的经济制裁。与此同时，美国的军事力量威慑了对手，共同防御条约为盟国提供了保护，同时让他们紧紧依附于美国。

但如果美国的攻势过于引人注目，行动背信弃义，其合作伙

伴将不会支持美国的下一次行动，制裁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也不会出现更多自愿的多边主义联盟。随着强制权力的下降，美国控制外交事务的能力也会随之下降。

特朗普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置于对脆弱国家赤裸裸的勒索上，此举产生的后果不可估量，比一位腐败的总统或一次被操纵的选举更严重。如果这种违规行为得不到制止，或者成为一种惯例，实力较弱的国家将放弃对美国权力的依附，卑鄙的滥用行为会导致盟约无效。当美国的竞争对手急于制定自己的一套规则时，美国强制力的特权将一去不复返。

美学者：蓬佩奥或将黯然离场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10 月 5 日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亚伦·戴维·米勒（Aaron David Miller）等人的文章称，蓬佩奥很可能以美国现代以来最差国务卿的形象黯然离场。

在担任国务卿期间，蓬佩奥在中东等地区表现不佳。他强硬与对抗式的外交风格使美国与伊朗进一步滑向战争边缘，两国就核问题展开新对话的希望几乎已经破灭。在世界其他地区，蓬佩奥一直是特朗普破坏美国盟友关系和多边主义的“好搭档”；支持制裁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以推翻该政权；曾提议对朝鲜采取孤注一掷的去核化外交，但迄今这种策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蓬佩奥不仅参与了特朗普揭露前副总统拜登丑闻的计划，还参与了解雇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此外，他未能阻止对现任及前任国务院官员向希拉里私人邮箱发送邮件的调查，这项调查影响了这些官员们的职业生涯。

蓬佩奥的前景很难出现好转。他的声誉在“电话门”事件中受到了打击，随着弹劾调查的深入，其声誉可能会进一步受损。

伊朗和朝鲜将是棘手的难题，需要一定外交技巧才能成功应对，而这是蓬佩奥目前所缺乏的。他似乎更擅长对伊朗、朝鲜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讲和说教，而不是与他们进行谈判。通常人们需要时间并通过不同视角来评判一位国务卿的表现，而对蓬佩奥，目前已经有了结论。

兰德公司：虚拟社会战争的新风险

兰德公司网站近期发布报告称，先进信息环境的演变正迅速创造一种新的可能的网络攻击，包括试图操纵或破坏经济和社会系统有效运作的信息基础。兰德公司研究人员在分析这种日益增长的威胁的特点及其对未来的影响时，将其称为虚拟社会战争。报告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国家安全不仅将越发依赖一个具有强大复原力的信息环境，还将依赖于强大的社会形态（social topography）。这可能需要传统的信息安全形式、强大的中介机构以及从事预防社会操纵技术的工作者。第二，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工作与责任界限正变得模糊，国家安全将依靠于公共投资和私营部门的合作。第三，不同网络之间的冲突将日益增加。国家行为者可能会开发一种网络，加强其虚拟社会战力。这种用于打击全球网络危险因素的网络系统将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和描述。

基于此，报告提出以下建议：在研究与认识上进行投资，发掘不断发展的信息环境的真实特征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了解信息环境演变中的关键因果动态、人们如何对各种形式的社会操纵作出反应以及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开始建立防御与修复系统，以应对最恶劣的信息社会操纵形式；严肃对待当今社交媒体所扮演的主导角色，以及该领域中许多新兴信息控制模式的性质；投资

建立新的、广受信任的信息中介机构，以帮助美国人民理解目前发生的事件；着手建立限制使用虚拟社会战争的国际规范；更好地理解新兴技术的工作原理与弱点，特别是人工智能驱动的信息渠道、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以及算法决策。

美学者评估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是对美国亚洲政策的有益补充。尽管特朗普政府做出了种种努力，但美国当前的做法似乎难以获得支持。

《外交家》杂志网站近期登载乔治城大学外交研究所研究员艾略特·西尔弗伯格 (Elliot Silverberg) 的文章，评估了特朗普上任两年来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情况。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地位的未来取决于美国地区联盟网络赋予华盛顿的合法性。然而，就某些方面而言，美国近期与亚洲伙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最近，一项针对东南亚地区精英的调查发现，59.1%的人认为美国的力量正在减弱，21.2%的人认为华盛顿的影响力没有改变，68%的人认为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与东盟的关系已经恶化。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是对美国亚洲政策的有益补充。特朗普政府虽做出了种种努力，但美国当前的做法似乎难以获得支持。日本和韩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表明，即使重要的盟友也不会无条件地支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建设项目。

问题首先在于，美国和亚洲之间的认知差距日益扩大。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美国对传统盟友的保护主义做法，对战略竞争对手采取的排他性政策以及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不置可否的态度，使国际社会对美国致力于实现包容性繁荣的承诺产生了怀疑。

虽然，美国希望通过印太商业论坛和《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BUILD）等平台在工作层面推动发展援助，但美国方法通常受制于有限的资源，以及政策制定者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调。此外，特朗普政府对自由贸易规范的持续攻击，以及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全球机构和多边倡议的蔑视，进一步突显出华盛顿缺乏连贯的政策。

处于各种军事和商业要道上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国家对是否接受“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愿景犹豫不决。东盟成员国、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对中国连通中东和非洲的“珍珠链”战略感到不安，但他们依赖来自北京的经济激励，这导致他们做出灵活又含糊的反应，时而靠近、时而远离华盛顿。由于美国对与中国竞争的关注不断增加，一些亚洲中小国家指责华盛顿疏远了他们，并担心美国不再坚持“以东盟为中心”。

美国政策制定者今后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管理外国对美国在印太地区承诺的预期。美国应向地区国家表明，其努力并不完全是为了对抗北京。特朗普政府可采取更多措施，引导该地区的发展政策，推动可持续和包容的治理原则成为惯例。

在印太这样一个多样化和动荡的地缘政治格局中，通往良好治理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从长远来看，美国在亚洲的长期存在，可以让那些心存疑虑的国家相信，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有能力在一段时间内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美国政治/其他

民调显示鲜有美国人相信特朗普会因弹劾而下台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10月7日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威廉·盖

尔斯顿 (William A. Galston) 文章，研究了“电话门”爆发前两周，有关该事件以及美国其他高级官员行为的信息对公众产生的影响，并归纳了五条主要结论。

其一，因为特朗普总统一直不同寻常、充满争议，因此自他上任以来，始终有相当一部分公众希望他下台。在衡量“电话门”发生后支持弹劾特朗普的比率时，应该基于一个原本就比较高的起点。此外，（有关“电话门”的）新信息而非已有趋势导致弹劾的支持率发生了变化。

其二，新信息的发布对公众关于弹劾总统的看法有显著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针对所有美国成年人开展的八项调查结果都是相似的，44%的人支持弹劾，40%的人反对。总体上，新信息似乎让公众对弹劾的支持率提高了约 7 个百分点，反对率则减少了近 14 个百分点。尽管如此，弹劾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差距也很小。

其三，对于 9 月 23 日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同党派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反应也存在明显差异。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中支持弹劾的人的增幅远超共和党人。对于代表“深红”地区或州的多数共和党民选官员而言，政治倾向仍然是支持特朗普。

其四，10 月初的调查显示，事件最初曝光引起的弹劾支持率增长虽在放缓，但随着公众接收的信息增加，依旧有增长空间。一些反对弹劾的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有可能会改变主意。

其五，目前很少有美国人相信特朗普会因为参议院的弹劾投票而下台，很多人甚至怀疑是否值得发起弹劾投票。《今日美国报》和益索普联合发起的民调发现，只有 15% 的受访者以及 9% 的独立人士认为特朗普会被弹劾。即使是民主党人也对此不抱多大希望，只有 25% 的人认为弹劾程序能成功。

特朗普用来“逃脱惩罚”的两种心理学手段

《大西洋月刊》期刊网站 10 月 7 日登载纽约城市大学新闻学教授彼得·贝纳特 (Peter Beinart) 的文章，分析了特朗普用来逃避一切的心理伎俩——试图重新界定可接受行为的准则。

在被曝光要求乌克兰总统调查他的潜在政治对手拜登后，特朗普公开要求中国也这么做，再次公然破坏外国势力不能干涉美国选举的原则。虽然，他有关中国的言论没有惹出大麻烦，但此举在政治上可谓精明的一招。

特朗普本能地掌握了一种心理学理论，即人们不太重视那些没人特意隐瞒的信息。人们还不太确定，邀请外国干涉美国大选是否构成“严重犯罪或失检行为”。通过公开要求此类干涉，特朗普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这并不重要。

此外，通过公开要求乌克兰和中国调查政治对手，特朗普表现出对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的自信。虽然人们可能认为，大多数美国人会把特朗普的自信视为不知羞耻，但有学术证据表明，当一个人被证明做了错事，他是否能“看似合理地否认”，对于他人的判断非常重要。特朗普的承诺通常模棱两可，使人很难具体反驳。特朗普不断中伤揭露者“专业知识或可信度”的行为，使他更具优势。

在一些倾向于怀疑相互矛盾的信息来源的选民中，特朗普自信地否认错误，并重新定义可接受行为准则的伎俩奏效了。

美媒：激进主义崛起背后的因素

《华盛顿邮报》网站 10 月 9 日载文称，激进主义浪潮严重冲击西方世界的政治秩序，有四种理论有助于认识激进主义崛起

的原因。文章摘要如下：

人们曾以为美国政治有原则：有些事必须要做，如善待老兵；一些不能做，如支持提名被控性侵的人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请外国领导人调查政治对手的家人，或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竞选总统。如果这些规则曾经被遵守，那么过去五年它们已被彻底摧毁。

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激进主义浪潮已经淹没了整个西方世界稳定的政治秩序。目前，至少有四种理论有助于认识激进主义的崛起：

曾在里根政府担任国务卿的经济学家乔治·舒尔茨 (George Shultz) 认为，联邦政府的不断集权化加剧了社会分裂，选民对一些机构的信任度下降，而且把一切都联邦化还会把每一个政治问题都变成重大问题；德国经济学家曼努埃尔·芬克 (Manuel Funke) 等指出，“系统性金融危机”会引发政治危机，似乎尤其会助长民粹主义右翼势力；埃里克·考夫曼 (Eric Kaufmann) 在其《白转型》一书中提出，随着移民率上升，白人多数派感到他们的文化和人口优势面临风险，于是他们纷纷倒向承诺控制移民的候选人；马丁·古里 (Martin Gurri) 的《公众的反抗和权威的危机》一书进一步解释了左翼人士也变得激进的原因：21 世纪的信息爆炸致命地削弱了维持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旧等级制度，互联网已经打破了信息和专业技术的垄断。

上述四种理论，每一种都很有说服力，都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无论是下放政府权力还是重新考虑移民政策。但与其试图选择最有可能的原因，不如考虑一下这些解释可能都是正确的。

调查显示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制造业处于衰退之中

《华尔街日报》网站 10 月 10 日报道称，三分之二的经济预

测者在一项调查中表示，美国制造业处于衰退之中，预计 2019 年下半年的整体增长将进一步放缓。

《华尔街日报》于 10 月 4 日至 8 日对 50 位美国经济学家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65.3%的私营部门预测者认为美国制造业陷入衰退，或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季度出现萎缩。预测者对 2019 年下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也有所下降，美国第三季度经济产出平均增长 1.82%，第四季度增长 1.77%。这两个数字低于 9 月份的调查，当时的预测增长率分别为 1.92%和 1.81%。

受访者在经济前景的评论中，大多提到了不确定的贸易形势、疲弱的全球增长和美国的政治动态。佐治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家拉吉夫·达万 (Rajeev Dhawan) 表示：“一连串的‘冲击’接踵而至：全球增长停滞、波音 Max 惨败、IPO 市场失败、通用汽车罢工、选举周期低迷，以及弹劾风波加剧。”

不过，经济展望集团首席全球经济学家伯纳德·鲍默尔 (Bernard Baumohl) 在调查中表示：“目前美国工厂就业仍处于 10 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因此说美国制造业处于衰退还为时过早。”

分析称，制造业在美国 GDP 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约占总产出的 11%，约占私有部门总就业的 10%，因此，制造业的收缩并不一定意味着 10 年的扩张即将结束。

美国国防部的采购有何新变化？

十多年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防工业计划小组”(DIIG) 每年发布一份年度报告，以分析美国国防部买什么、如何买以及从谁那里买。该小组近日发布了新的年度报告，分析了美国国防部在 2018 财年采购的变化趋势。报告摘要如下：

自 2016 财年起，美国国防部的防务合同开始回升，这一趋

势一直持续到 2018 财年。2018 财年的防务合同金额为 3645 亿美元，较 2017 财年的 3311 亿美元增长 10%。总体上，2015 至 2018 财年，防务合同金额增长了 25%。

尽管特朗普政府以及 2018 年国防战略强调了现代化方面的优先事项，但美国国防部的投资还没有大幅转向与国防战略有关的技术。在防务合同回升的前两年，产品类合同的金额大大超过了服务类和研发类。2018 财年，服务类和产品类合同金额分别增加了 10%和 11%。与此同时，研发类合同金额只增加了 4%，在防务合同总额中所占的比例降至本世纪的最低水平。总体上，2015 至 2018 财年，产品合同金额在过去三年增长了 35%，服务类合同金额增加了 17%，而研发类同期仅增加 10%。

虽然国防部在产品、服务和研发方面的投资比例没有发生重大转变，但在 2018 财年，产业部门层面的变化更为显著。2018 财年，飞机合同金额从 2017 财年的 886 亿美元下降到 846 亿美元，降幅达 5%；空中和导弹防务合同金额增加了 53%；设施和建筑合同金额从 2017 财年的 395 亿美元增加到 2018 财年的 473 亿美元，增幅达 20%；陆地载具防务合同总额为 129 亿美元，较 2017 财年的 85 亿美元增加了 51%；军火与导弹合同额增加了 17%，从 189 亿美元增加到 222 亿美元。

未来几年，随着采办系统会响应国防战略中提出的现代化重点，部门层面将继续发生变化。可以预期，防务合同金额可能进一步增加的有：核能；太空；网络空间；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C4ISR)；空中和导弹防御。

2018 财年，美国海军的防务合同额较 2017 财年下降了 3%，由 1131 亿美元下降到 1097 亿美元，海军在防务合同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由 34%降至 30%；美国空军的合同额继续逐年上升，较前一年增加了 15%，上升到 728 亿美元；陆军的合同额较 2017

年增加了 15%，从 809.7 亿美元到 931.7 亿美元；国防后勤局 (DLA) 和导弹防御局 (MDA) 的增长率分别为 26% 和 51%。

CSIS 之前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与国防部有业务往来的主要供应商的总数和新进入国防市场的主要供应商的数量持续下降。2018 财年，这两种趋势仍在延续。数据显示，2018 财年，与国防部有业务往来的主要供应商总数下降了 9%，而新主要供应商的数量下降了 7%。自 2015 财年以来，与国防部有业务往来的主要供应商总数下降了 15%，而新主要供应商的数量下降了 16%。

在防务合同回升的头两年里，五大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雷神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在四类供应商中表现最好，其次是小型和中型供应商，而大型供应商表现最差，合同额下降了 1%。然而，这些趋势在 2018 财年发生了变化，五大承包商的销量略有下降，而其他三类供应商的销量增长速度大致相同。

由于美国国防部和国防战略都强调打造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并试图吸引非传统防务公司与国防部做生意，因此，国防供应商数量下滑的趋势令人担忧。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